

林超民 主编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民族史视角下的 近代中国论稿

潘先林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民族史视角下的 近代中国论稿

潘先林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潘先林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林超民主编)

ISBN 978 - 7 - 81112 - 814 - 7

I. 民… II. 潘… III. ①中国—近代史—文集 ②民族历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K250.7 - 53 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6916 号

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

潘先林 著

责任编辑: 宋 武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814 - 7

定 价: 49.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www. ynup. com

E - mail: market@ ynup. com

总 序

当今图书市场一片繁荣兴旺，好书层出不穷，不断有各种丛书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相比之下，历史研究的书籍市场有些冷清，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就更加惨淡。

就在如此不算景气的环境中，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民族史研究者在追名逐利的狂潮前、在走场作秀的喧闹中、在吹嘘鼓噪的轰动下，沉住气、静下心、安住神，孜孜矻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不事张扬、不图名利，苦守寒窗，为人民保存记忆，为民族书写历史。

中国民族史专业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需要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诸多学科的知识。要取得成绩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的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

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我们有些另类。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学者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是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是民族自尊与独立精神。学问之事可大可小，良知、责任、自尊则不可或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因循守旧、不拾人牙慧、不包装吹嘘，绝不参与忽悠“卖拐”的闹剧。

我们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二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也不是大多数人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馅饼；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一旦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即刻就会变成嘻嘻哈哈、唧唧喳喳的俗事。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经方国瑜、江应樑、尤中、木芹等前辈的开拓、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学术传统优秀、学术成果一流、学术人才杰出、学术积淀深厚、学术梯队良好的五大优势，在国内外处于先进地位。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同仁们继承方国瑜等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

扬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不急于出世成名，静心致力于传世精品的锻造，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在全国先进的地位，也许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与多高的水准，只是我们在别人投机取巧、图方便、走捷径、搞“快餐”的时候，坚持方国瑜老师提出的“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十字箴言，不苟且、不随意、不草率、不媚俗，沿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方国瑜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西南研究丛书十一种。这是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年代，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心中安放宁静的书桌，营造追求真理的氛围而作出的杰出成就。经过历史的检验，这套丛书堪称西南研究的典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编辑出版《新松集》、《新浪集》、《新风集》、《新翼集》，收录从1988年以来的博士论文一篇、外国留学生硕士论文四篇、硕士论文三十九篇。2001年至2004年编辑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出版博士论文五种。还有几本博士论文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等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有五项目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又积累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不敢说这些成果都是优秀的，但我们自信这些成果都是独立思考、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我们从中选取十一本，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公开出版，希望得到学术界与社会的批评与教正。对于我们来说，批评比赞扬更重要、更宝贵，也更值得珍惜。

林超民

2009年8月于补拙斋

序

先林教授与我是相隔一代的学人。我大学本科毕业那一年，先林正好出生。

我进入大学时，史学界正在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厚今薄古”的方针。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近现代史作为必须“厚”的一面予以高度重视成为“强势”学科。古代史作为必须“薄”的一面被强令“弱化”，民族史则成为极少人问津的“冷门寂静”的科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号下，近代中国的历史，突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革命运动史。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三次革命高潮。近代民族史也就是围绕三次革命高潮的民族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史被简化为“儒法斗争史”。中国近代史也就是爱国的法家与卖国的儒家之间的斗争史。

1978年9月，我考取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重返校园，师从方国瑜教授研习。这时史学界开始清算“四人帮”的祸害与流毒，对于1950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范式、方法深入反思，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激励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冲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罗网，向着解放的大道迅跑。

1989年夏，在经历了风雨雷电的震荡之后，我们迈步进入新的时代，这时先林考取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按照来自国家教委的规定，他们这一级研究生全都必须到边疆农村“接受教育”。他被安排到到孟连县勐马中学“锻炼”一年。1990年9月他回校开始研究生的研读学业。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国瑜师与应樑师先后作古。“世无英雄”，我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导师”的职责，先林成为我直接指导的第一位研究生。正如韩愈所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先林攻读硕士学位时，我刚好完成应樑师未竟的《中国民族史》编写工

作。20世纪60年代,国瑜师与应樾师编撰《中国民族史》,油印四册作为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教材。按照“厚今薄古”的方针,1840年以后的近代民族史成为重头篇章。其内容就是民族革命运动。我对占一册分量的近代民族史从主旨、纲领、理念、资料到叙事、诠释颇为不满。想彻底改写,可是能力与时间的限制,无法做到,便下决心将这一部分“割爱”。所以应樾师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民族史》。在与先林讨论研究方向时,我建议他主攻中国近现代民族史,鼓励他独立思考、独辟蹊径、独树一帜,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上做出超越前人的创造性成果。

先林是一个勤奋、执着、踏实、认真、严谨的学者。他不囿陈说,大胆创新。他以《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的博士论文脱颖而出,成为民族史学界、近代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把“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问题引入民国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用近代化的视角探讨云南民族史,突破了近代民族史就是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框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赞赏。

近年来,先林一直以“民族史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用“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史,发表了一系列有深度、有见地、有新意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在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有所创造,取得了别开生面的可喜成绩。

先林将民族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整合、认同及其曲折历程;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整合及其曲折历程;各阶层、各党派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探索和发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党派采取的民族政策及其措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各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各民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七个方面不仅解构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史的“民族革命运动”论、同时也不为近代“民族主义”所囿限。实际上是超越了两者的境界,令人耳目一新,比之我自己在大学时代的认知、比之我在研究生时代的认知、比之我多年来在研究中的认知,有所超越,深感“青胜于蓝”而倍加欣慰。希望读者能够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不仅欣赏作者创新的思路与深邃的论述,同时也能借此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与体悟。

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是近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先林对这一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认为清王朝从封建国家过渡到近代国家的努力和探索归于失败,并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已

无力担负领导中国各民族人民建立近代独立民族国家的重任。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但是，由于革命派机械套用西方的“民族建国”理论，忽视了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及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中“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整体思想，“为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在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上的游移、含糊、矛盾甚至偏激埋下了伏笔，走过了较为曲折的过程”。先林对清王朝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家的建设上的经验与教训的分析颇有见地，显现他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思考颇为深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正因为具有学术价值，而有重要的现实社会意义。

近代中国是在与西方（含日本）的激烈碰撞中艰难迈步向前的。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纠葛持续不断。中国民族与西方的相互冲撞、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依存，也是近代中国史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大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密切。所以研究近代中国，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史，就不能不有国际视野。所谓国际视野，也要摆脱反帝、反侵略、反掠夺的国际斗争的单一模式，而要具有更加高远的目光、更加宽阔的胸怀和更加深邃的智慧。先林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在论述中有所阐发。

对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我向来持保留态度。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长远的历史，历代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具有很高的智慧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华夷无间，天下一统”，“四海之内皆兄弟”、“正统论”、“尊王黜霸”等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思想和策略。因此，国瑜师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理论，用以诠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规律，更加准确也更具说服力。先林对国瑜师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的理解、把握、运用不仅妥帖，而且允当。

费孝通先生认为：从秦汉到1840年的2000余年，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从1840年到当前，是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的历史阶段。对这个论断，我亦持有不同意见。我在1987年发表的《华夏民族形成时期的民族意识浅析》一文中提出，华夏民族形成时期的民族思想，已包含了中国古代社会民族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反映，对中国成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在2007年发表的《天下一统华夷无间——中国古代民族观述论》中，提出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确立，到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与发展，促进了中华整体观念的形成。天下一统是中华整体观念的基石，尊王攘夷是中华

整体观念的前提，五方之民共天下是中华整体观念的本质，华夷无间是中华整体观念的内核，正统观念是中华整体观念的灵魂，共同文化是中华整体观念的血脉。说秦汉到1840年2000余年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显然不符合中华整体发展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因之，把1840年到当前视为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的历史阶段，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用民族史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当不能抹杀秦汉以来2000多年华夏民族整体发展的历史，不能否认2000多年来帝王将相、仁人志士、各族民众对大一统局面与华夷交融的自觉努力。

中华民族在2000余年中的连续发展，有其内在的自觉，这就是《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华文化就是“致中和”的文化。“致中和”引导人生处理好个人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和谐；引导人类处理好与自然的和谐，做到天人合一；引导个人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相互和谐、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引导天下族类之间的和谐做到“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四海之内，若一家”。

先林的目标是要撰写一部《中国近代民族史》，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他不急于求成，而是从基础工作做起，收集整理史料，回顾学术发展的历史，研究前人的成果，总结百余年来近代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深入进行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又一篇见解独到、观点正确的论文。现在他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出版，就是为《中国近代民族史》的撰写征询意见和建议。先林的文章或许有可以商讨之处，但是先林独立思考、坚持不懈、认真严谨、一往无前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效仿。

做学问、搞研究是少数人的创新劳动，需要独立探讨的精神，需要独处深思的毅力，需要独辟蹊径的勇气。他们常常会在赶热闹的潮流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其实，“边缘化”并非坏事，也许正是一个学者有所创新的机缘。当你置身于喧嚣纷乱的闹市中自以为得意之时，你就自觉不自觉地趋俗、随俗、媚俗了，还谈什么创新与创造！这使我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一段话：“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北宋哲学家张载说过：“富贵福祥，将厚吾之主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诚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安贫乐道、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当是一个学者的

品格，也是一个学者取得成功必备的心灵。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我与先林是相隔一代的学人，但是我们并没有所谓“代沟”。自从先林做研究生和我在一起以来，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商量旧学、增益新知，时常有“珍重朋友相切磋，须知至乐在于今”之感。

在我们祝贺先林《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出版的同时，期盼他以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撰写的《中国近代民族史》早日问世。

林超民

2009年11月11日于补拙斋

目 录

总 序	林超民 (1)
序	林超民 (1)
前 言	(1)
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	(7)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	
——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	(35)
“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与“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	
——对“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再讨论	(54)
略论晚清时期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觉醒	(69)
晚清王朝由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努力和探索	(83)
中国资产阶级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和探索	(103)
“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确立与渊源论析	(128)
“五族共和”思想的内涵与实质探析	(138)
论“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	(150)
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及设想	(163)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治理	(177)
从“五族共和”到“国族主义”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	(228)

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	(246)
唐继尧与云南护国起义	
——兼议当事人执笔史料的使用	(257)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271)
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	(286)
略论红军长征时期国共高层对云南的认识及其影响	(297)
一份有关龙云家世及其妹龙志桢的资料	
——《贞孝褒扬录》简介	(310)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	
——《云南史地辑要》概说	(318)
略论陈度及其《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	(333)
蒋介石在昆明的两篇“演讲”概说	(349)
后 记	(362)

前言

1989年9月，我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入学第一年，按照国家教委要求，到孟连县山区中学执教一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年生活，使我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社会有了亲身感受和深切体验。1990年9月返回学校正式研读硕士学位课程，入学后，适逢业师林超民教授协助江应樑先生编纂的《中国民族史》三卷本出版。因我此前热衷于研习云南近代史，林老师说：“中国民族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是近现代民族史。近现代民族史是最具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课题，应加强研究，要尽快改变民族史研究头重脚轻的状况。”建议我以中国近代民族史作为研究方向。他将因观点、方法、体系、资料陈旧未能被收入《中国民族史》三卷本的“近现代篇”手稿交我研读。我将手稿带回，展阅一过，其内容仍属民族革命斗争史，觉得应该跳出“民族革命运动”的窠臼，彻底改写，但是如何改写，一时尚无清晰的思路。1996年开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认识到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较为薄弱是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没有必要喋喋不休。但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进行研究？却较少有人进行讨论。其时有关中国“近代化”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于是我撰写了《“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民国彝族官员群体与滇川黔边彝族社会》的“导论”，提出应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鉴于国内学者从地理角度将中国的近代化分为沿海、中部和内地（或称“腹地”）三种类型，论文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近代化称作“边疆民族型”，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四种类型。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等。这是我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思考的开始。

1998年，林超民老师与我商量撰写《20世纪中国民族史》，经过长时间

反复讨论，我们先后提出了几种编纂提纲。云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李惠铨编审对我们的写作计划与提纲颇为赞赏，即刻列入出版社重点选题，催促我们尽快交稿。我们并未因此急于求成，匆忙写作。我们试图突破前人将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写成“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的模式，力争在编写思想、写作体例、资料运用诸方面都有所创新。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迄今为止，我们依然在“上下求索之中”。在思考未成熟之前，在资料未充分积累之前，我们不敢轻易动笔，仓促成书。

这一时期，在林超民老师的带领下，结合“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生课程的开设，我阅读了大量学术史著作，包括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张旭光（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纲》，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少数民族史·近代史》（油印稿，1961年）等及方国瑜、费孝通、王钟翰、杜荣坤、史金波、陈连开等当代民族史研究大家的著作，终于对中国民族史学科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同时，阅读这些著作，对我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思考也有较大帮助。当读到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述：“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负之责任。”我感到迷惑不解，如此，则“中国史”与“中国民族史”有何区别？读到方国瑜先生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似乎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思想。尤其是方先生的论文，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理论文章。方先生说：“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权而言。……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整体是指“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有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有着浓厚的一致性”。这里，对“统一”概念的理解似乎没有问题，而对“整体”概念的理解则略感抽象。林超民教授进一步阐释说：“整体的概念是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

的内在联系与凝聚。”（《中国民族史·绪论》）这对我而言，似乎仍是一个抽象的界定。

2002年，我开始尝试写作《中国近代民族史》，很快完成了晚清部分，撰写了《略论晚清时期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觉醒》（《史学论丛》第九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晚清王朝由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努力和探索》、《中国资产阶级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和探索》等文。很快，我意识到这部分稿件“研究”的味道较少，主要是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部分个人的看法而已。进入民国部分后，可参考的前人成果明显偏少，只能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于是我停止了《中国近代民族史》的写作，从资料入手，潜心研究民国时期的民族史。在一次偶然的学习中，我读到了费孝通先生1997年发表的《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费先生说：“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原来“中华民族史”可以理解为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这使我突然之间豁然开朗，眼界为之一宽。由于我长期从事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整天耽耽于民族史学科的体系和规范，诸如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范围与对象、作用与意义等，井底之蛙，所见有限。现在从费先生的思路出发，跳出学科的限制，将中国民族史理解为“民族史视角下的中国史研究”，这就使许多原来模糊不清、感觉抽象的问题逐渐清楚起来，对梁启超、方国瑜、费孝通诸先生的论述也有了新的认识。此后又读到了章开沅先生《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何芳川先生《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等文，启发良多，于是我撰写了《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一文（《民族学评论》第二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主张从民族史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表述为近代中华民族和西方列强对抗中的自觉历程及其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整合、认同及其曲折历程；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整合、认同及其曲折历程；各阶层、各党派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探索和发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党派采取的民族政策及其措施；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各民族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各民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将该文前三部分写成《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发表（《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中

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7年第12期转载）。此后，以这一思路和框架为指导，接着撰写了《论“五族共和”思想》（《第八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台北国父纪念馆2005年版），在林超民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国父纪念馆举办的“第八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由于论文较长，且部分论述此后有了变化，于是将其修改写成《“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确立与渊源论析》（《思想战线》，2006年第3期）、《“五族共和”思想的内涵与实质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论“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三文发表。其后，相继撰写了《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及设想》（《中国藏学》，2008年第4期）、《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治理》、《从“五族共和”到“国族主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等论文，其中《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及设想》一文参加了“第五届河洛文化及2006年汉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洛阳），《从“五族共和”到“国族主义”》一文是应“纪念尤中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征稿通知撰写的。由于在思路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又重新反思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近代化”问题，撰写了《对“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再讨论》，参加“中国道路：历史探索与比较——第四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武汉），之后以《“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与“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对“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再讨论》为名发表（《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主张将地域的“边疆型”和族群的“少数民族型”近代化进行区分。地域的“边疆型”是指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可以将其界定为“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四种类型；族群的“少数民族型”是指“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属于“沿边型”近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主要讨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沿边地区各少数民族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国家认同等。

与此同时，我从民族史视角对云南近代史的研究也给予了关注，鉴于唐继尧研究中“正统论”（以孙中山广州政府为正统）、“异内外”（“边陲”地区的唐继尧公然想统一中国，称“东大陆主人”）思想的局限，以及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是“中心”与“边陲”之间松弛隔绝的关系变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的认识，我撰写了《唐继尧与云南起义——兼议

当事人执笔史料的使用》（《西南古籍研究》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鉴于红军长征使地处边陲的云南第一次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和国共两大政党的视野，国共双方高层包括后来的大批国家领导人亲身经历了广阔的边疆民族地区，他们对云南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于是撰写了《略论红军长征时期国共高层对云南的认识及其影响》；鉴于长期以来龙云投靠蒋介石南京政府受到严厉批判，我们认为，龙云投靠蒋介石时以“清共”为代价，“逮捕并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也认为，“龙云政府之投靠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客观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云南多民族地区的‘自立’倾向，增强了云南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国国家的认同和近代中华民族的凝聚”。于是撰写了《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从事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研究，关键史料的使用和发掘是解决问题的核心。由于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有关边疆民族地区的史料完整保存下来的较少，我对民国时期的档案、回忆录及《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予以了较大关注，使用了部分从未引起注意的材料。如《共和统一会宣言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关于“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的论述显然来自“共和统一会”对“统一”的解释；又如清末安健署名的《贵州南龙桥土司安健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七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末沿边土司对清廷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及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龙云编辑的《贞孝褒扬录》所收其妹《胞妹龙志桢志略》、《胞妹志桢墓表》、《龙贞孝传》、《征题贞孝龙女士事略启》等，对研究龙云的家世及其民族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蒋介石1935年5月视察昆明时作了题为《希望全滇民众负起民族复兴之责》和《建设新云南与民族复兴》的演讲，提出了“建设工业化的新云南”的号召，对三四十年代的云南现代化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林超民老师带领我们致力于《云南近代史料丛刊》的编纂，于是我遵从师命，陆续撰写了《一份有关龙云家世及其妹龙志桢的资料——〈贞孝褒扬录〉简介》（《南中》，1994年第2期）、《许指严〈乌蒙秘闻〉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略论陈度及其〈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